

我的搬迁故事

■江苏师范大学 杨绪敏

大凡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都有多次搬迁的经历,而我成长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搬迁。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毕业留校任教,从学生宿舍搬到教工宿舍,3位青年教师同处一室。那时的徐州师范学院占地面积不足200亩,师生员工加起来不到3000人。很多青年教师住的是筒子楼,每家住15到20平方米不等的单间、厕所公用。

留校不久我就到厦门大学进修,与几位研究生同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宿舍。一年后我转入北京大学进修。当时一位朋友就读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为了解决我的住宿问题,他把他在研究生院的床位让给了我(当时他寄宿北京师范大学内)。之后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搬到北大25号楼,有了一个18平方米的单间,租金每月9元。

在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进修期间,我感受到了两校中青年教师住房的狭小和简陋。记得一次我去拜访北京大学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他们一家四口竟然住在筒子楼里,面积不足20平方米,儿女的床铺中间只能用布幔来隔挡,当时全国高校住房条件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1980年7月进修结束,我返校任教,不久领了结婚证书,但申请婚房始终没获批准。眼见婚期已到,系领导决定腾出一间办

公室做临时新房以解我的燃眉之急。这间临时新房就在现在云龙校区原中文系所在楼的一层,房子里还有一台据说是罗马尼亚产的20寸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奢侈品,新婚第二天还有不少教工子女吵着要到我的新房看电视。

开学后办公室无法居住了,于是就有了第一次搬家,搬到师院北院一间9平方米的宿舍,与中文系李成蹊教授为邻。这间房子仅有面北的一扇窗户,只能放置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橱。由于不通风,盛夏时天气尤其热,便在室内放置一大盆凉水以降温。

一年后学校调整住房,我幸运地调整到东院11号楼一间16.8平方米的旧房。这时我担任臧云浦教授的助手。臧教授为人正直、谦和,一生努力工作,潜心研究,精心育人。他常常勉励我“工作要勤,待人要诚,做学问要精”,并购买《史通》赠送于我。从那以后我花了多年的功夫潜心研究刘知几与《史通》,先后发表了2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我的助教工作整整做了9年,其间,我于1983年至1985年间又获得一次难得的深造机会。当时教育部为了解决高校历史文献学师资短缺的问题,下文委托华中师范学院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教授开办历史文献研究班,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培训。

华中师院的住房条件也十分紧张,我们4人一间。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张先生专门找校长特批了一套煤气灶,供我们热饭、烧水用。张先生主办这个研究班本着博采众长的原则,先后延聘了刘乃和、章开沅、张岂之、冯天喻、肖董夫、仓修良、周大璞等知名专家学者授课。此次学习,基本奠定了我日后研究的方向。

1987年职称评审解冻,我被聘为讲师,搬进了东院9号楼25平方米的两居室。房间大了,有了放置书橱的地方,也就有了比较安静的读书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原有的硬件设施已经无法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84年,学校决定在徐州南郊牛头山东麓征地建设一分部,经过3年的建设,基本初具规模。1989年,徐州师专并入徐州师院,在师专原址上成立二分部,由此形成了一校三点的办学格局。历史系于1990年7月搬迁到二分部,由于当时办学条件简陋,所以学生戏称二分部为“侯山窝大学”。这时教工宿舍的建设也加大了力度,学校分别在今云龙校区的东院、二分部、积翠新村等处建了一批新宿舍。

1989年我再次搬迁至积翠新村一套34平方米的两居室,我的邻居是中文系韩陈其副教授。一天,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董事长

高本钊先生突然造访韩老师家洽谈出版事宜,仓促之中,韩兄借走我家的圆形餐桌和白色桌布,并从我家拿上一盘水果以应景。后来见面聊及此事,还引为笑谈。在积翠新村一住就是8年,我先后完成了《中国历史要籍研究资料辑要》《自然·思维·人生》等书的编纂。1993年我被聘为副教授,不久开始担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在系主任岗位上干了一干就是8年,其间实现了历史专业硕士点零的突破。

1997年第五次搬迁,我住进了今云龙校区东院11号楼三室一厅的居室,从此有了单独的书房,开始潜心完成早已开始撰写的《中国辨伪学史》。1999年,我被聘为教授。

2000年学校先后在一分部、二分部盖了几栋教授公寓,这是最后一批带有福利性质的分房。我有幸在二分部购得一套146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两卫的住房,一直居住至今。由于房间较多,便以两间作书房和工作室。在这里完成了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多本专著,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我在江苏师大工作了40年,经历搬迁6次。搬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校的发展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的速度,同时也勾勒出个人的人生发展轨迹。今后还会不会搬迁呢?答案是肯定的。

星星和月亮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葛兆磊

过去的40年,是风雨兼程的40年,是蓬勃发展的40年,更是春风化雨的40年。作为特殊社会人群,改革开放之于我们残疾人来说,就像是黑夜中皎洁的月光,用柔和的清辉照亮了我们这些在月亮身旁闪闪烁烁的星星。

我是一名先天性脑瘫患者,从小因为早产,导致双腿不能独立行走,行动受限,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理。自身能力的缺失,让我对社会这个大环境极不适应。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学前教育,只在村里一所私人幼儿园读了一年,说是上学,倒不如说是放养,村里的幼儿园也没有正规的课程,我也无法和健全人一起玩耍,所谓的上幼儿园只不过是爷爷奶奶托老师照顾我而已。

到了上小学的年纪,父母担心我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跟上教学进度,于是先让我在家乡的村小试读了一年。觉得我除了写字速度较慢以外,其他方面还算可以,就把我接回南京,准备在街道的职工子弟小学上学。那时的我们,对于特殊教育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就算是像我这样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也是鲜少有的。校长一开始并不同意我随班就读,怕影响教学进度。后来经过我父母的反复沟通,最终同意让我旁听一个学期,如果跟得上,就转为插班生,考试之后看成绩再决定是否留校就读。就这样,我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开启了求知的旅程。

到了2010年,我上初二的时候,父母带着我到街道残联办了残疾证,自此之后,街道残联每逢国庆和春节,都会发800元慰问金,虽然这一点慰问金微不足道,但是这一制度的出现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基层群众组织对残疾人的关怀。快中考时,父亲突然告诉我,只要我好好努力,考上高中,街道残联每年都会给1000元助学金,如果考上大学,每年会给2000元助学金。不知不觉中,我发现,似乎我们残疾人正越来越受到重视。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高二那一年一个周末,雨花区残联出台了一个特

殊学生助学项目。我们街道残联的主任帮我申报了这一项目,结果在那一年,我很荣幸地获得了2000元助学金。

决定我命运的一件事发生在我高三那年,那一年政府出台了《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其中明文规定,肢体残疾的学生可以将高考时间延长30%。我因为肢体残疾,从小书写速度极为缓慢,这也无疑成了我学习生活中最大的困扰。正因为有了这一份特殊的规定,让我能够在充足的时间内答卷,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而高三填报志愿时,我的班主任向我推荐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而我也没有让他失望,顺利地考入了这里。在当时刚刚转为本科的学校,圆了我的大学梦。

进入大学之后,接触了特殊教育这个专业,感受到了母校给我带来的人文关怀,我这才明白,我们残疾人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之一。我开始思考,怎样将自己融入健全人群体之中,如何超越自身的残疾,发展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贡献。这种理念的更新所带来的精神上的震撼远比物质上的资助有意义得多。

而我今天能够坐在学校中,见证这一切的发生,完全全得益于改革开放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是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明的进步,那么对于残疾人的观念还会停留在陈旧的状态,改革开放为我们这些社会边缘群体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使我们这些星星能够紧紧地围绕在月亮周围,散发着自己的光亮。

当然,不可否认,至今为止,残疾人的社会参与度、产出度依旧很低,我国关于特殊教育的法案还有待完善。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过一个漫长过程,40年的时间似乎太短,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目前的速度,在不远的2050年,全国8500万残疾人一定会迈得更远、登得更高、创造更多。如果说健全人就是明亮的月亮,我相信,有一日,我们残疾人也会成为夜空中耀眼的明星,与月亮一起,共同照亮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银发生辉 又见芳华

■江南大学 沈月

工作,至今著书立说700多万字。

“从小我就想成为一名学者,著书立说。”大学毕业后,恰逢动乱,金老师心中的理想被迫中断。“那时候,别说著书立说,就是看书也得偷偷地。”在上山下乡、农村锻炼的岁月,金老师偷偷读书,静静思考,默默积累,他相信总有一天,所做的研究会取得成果。

一等便是10年。“对国家而言,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对个人而言,改革开放解放了我的创造力。”从此,他专心投入到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去,成果丰硕。他用他的笔讲述中国牌坊文化,记录元明抗倭历史,解读历代廉政碑文,梳理钱伟长教育思想……

现在年逾七旬的他,仍然葆有旺盛的创作力。在继续科研著述的同时,义务为青年学子作专题讲座,积极投入到千名老科技工作者为千家企业服务的“双千”活动中,发挥余热。

“没有一个人的命运是完全脱离时代的。其实这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能够创造的空间。”

向左、向右、向前看

姜国栋教授,1949年出生,“老三届”,1977年参加高考,进入无锡轻工业学院(后合并更名为江南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2009年退休。原江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退休后担任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姜书记说话总是面带微笑,温暖而亲切。身为校关工委常

“当时恰逢改革开放,思想得以解放,我们才有机会去讨论思考个体价值的问题。我那时就感到人生观、价值观不是教条的样理,它决定了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一生将如何度过。”

谢老师站了34年讲台,也教了34年德育课。“我一直在想,怎么在我的讲台上,把我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尽可能多地传递给于学生,引导他们走正确的人生道路。”退休后,她依然与学生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是改革开放改变了命运,所以总是想更多地回报于社会。现在我退休了,但德育教育不局限在课堂,它可以渗透到生活的点滴。”

是的,虽然她的人离开了讲台,但她的心却从未离开。

听从本心,无问西东

金其桢教授,1945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农村接受锻炼,做过中学教师、县人大常委会秘书。1984年调入无锡大学(后合并更名为江南大学),2007年退休。原江南大学学报编委会副主任、常务副主编,退休后任校“老科协”理事会副会长。

作为国内知名的历史文化研究专家,金老师自信笃定又不失谦和。1987年出版第一本专著后,笔耕不辍,相继出版17部著作,在全国数十种核心期刊上发表百篇研究文章,参加《无锡文库》等书的编撰

40年家校沟通之演变

■昆山市裕元实验小学 潘慧莹

了我们那一代学生童年的共同记忆。其实,这只是那个信息不通畅时代家校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老师激励学生好学上进的一种方式。

再有做坏事的,通常是老师在上学或放学时候拦住家长接送的自行车,或语重心长、娓娓而谈,或口若悬河、激愤难当。其实,那个年代很少有家长接送,我们都是结伴步行上学的。到了小学高年级,也有路远的同学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

家长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家校联系的传统方式,老师通常会讲升学形势、班级概况、需要家长配合的注意事项等等。记得初中最后一次家长会,主要内容是叮嘱家长做好考生考前思想工作,权衡自己的成绩,填报一个合适的志愿。别的家长都围着班主任老师问这问那,生怕遗漏什么,耽误自己孩子的前程。

我妈说,我爸等了一下,看看插不上话,就早早回家了,不屑与那些家长们为伍,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学期末的评语也是老师和家长沟通的一种方式。评语开头通常是“该生尊师守纪,团结同学,关心班集体,生活俭朴,学习认真”,老师道劲刚健的大字激励着我们,也让我们心生仰慕。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转折“但是”,父母们通常前面的都不看,专门看“但是”——“但是,希望能戒骄戒躁,严格要求自己,更要加强体育锻炼,让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小时候,我们上学靠步行,试卷靠油印,写作业靠煤油灯。我还记得我开学的消息,是一位同学冒着靠靠细雨,从学校走到我家告诉我——那时我家还没有电话。

时光倏忽一过,40年弹指一挥间。

副主任,虽已到古稀之年,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状态和紧密的工作节奏。和他一起走路,必须小跑跟上。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父母希望他有所作为,取名“国栋”。1966年取消高考,他的学业被迫中断。十年浩劫,他下过乡当过兵。1977年高考恢复,他抓住机会,改变命运。1978年改革开放,国家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他也进入大学,开始新的人生。

“我是幸运的,我在江大的岁月跨越了改革开放的40个年头。”作为“文革”后学校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姜书记见证、参与了学校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从1978到2018年,学校经历两次更名、三次合并,入选“211工程”,成为教育部直属院校。姜书记也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教师,从校办秘书成长为党委副书记。从在时的学校领导,变为退休后的关心下一代工作者。

“改革开放的40年是高速发展、不断探索、凝练正确方向的40年。这个过程中有过迷茫,走过弯路,但就像我们的人生:有时向左、有时向右,但最终总是目视前方。”教室里,姜书记正为青年学子进行“读懂中国”的专题讲座,依然面带笑容,却已满脸热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芳华。我的父亲,已于2013年去世。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很辛苦,但我却很幸福,因为我是老师,因为我赶上了好时代。”

现在,课堂可以直播了,通知可以群发了,老师的评语除了电子化以外,也更加多元、更平易近人了;家校联系的方式除了家访、面谈、电话,还有书信、语音、视频……这不是一人一校之改变,而是科技发展、时代变革、大势所趋。

任何现代化的手段背后其实都是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汗水。还记得暑假里,同事在朋友圈晒出的女儿早上返校测试,中午即收到老师反馈成绩的短信,大家惊叹于老师的神速,朋友圈一片点赞。这背后,是教师的敬业。

家校沟通方式的改变仅仅是近40年来教育手段、教育理念飞速发展的一个侧面,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我们对教育又有了新期盼、新追求——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幸福,更好地融入新的时代,成为更好的自己!

从小我就想成为一名教师,并以自己有一位做教师的父亲而骄傲。

父亲是中学教师,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他已人到中年,自觉终于可以有所作为,从此起早贪黑,没有节假日。即使是退休后,他也依然专注于教学。记忆中父亲陪伴我们兄妹的时间很少,书房、教室替代了家。我感动于父亲对教育的执着,也因惑于他对教育的执着。

直到2016年7月,我离开讲台来到学校离退休工作处,在和很多像父亲一样为教育奉献一生的教师们不断接触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到这份执着的缘由。

因为你,我们有了明亮的眼睛

谢振荣教授,1956年出生,当过农民做过工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成为教师。2016年退休后,向学生开放地的“心理热线”和“求助热线”,与学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从您的课上,我体味出一名真诚、坦率的老师是那么可亲可敬,我幻想有一天我能站在讲台上像老师一样以真诚的话语对待学生,我也将会得到学生的尊重,那将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谢老师说,这份学生的留言一直温暖着她。

“1980年《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这封信表达了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与张扬。”谢老师回忆说,信中内容激发了他们那一代大学生对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

据奶奶说,40多年前,我爸爸主任要动员他当班长,是步行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的,小矮凳一坐,老师敬业奉献的画面就在眼前。

我小时候既没电话也没微信,试卷是刻钢板油印的,老师要联系,主要是靠试卷上的签名和留言。记得有一次期中考试后,班主任特地用一节课念了试卷上家长的留言,用表扬家长的形式激励学生,在当时也是创新之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各班期中考试前十名是有一张小红红的,上面工工整整写了学生的名字、成绩和名次。考完后,拿着红纸回家,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即使有的父母不识字,看到红纸总是懂的,这是一种肯定,父母也会作盘兰花豆腐一下。由此,期中考试前夜,在被窝里祈祷各方神灵庇佑考试顺利,得一张红帖,就成